



青海省文物处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编著

青海文物



类号	26.328
册号	29968

青海文物

青海省文物处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编著

文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056号

撰 文 格桑本 刘 溥 卢耀光 李智信
摄 影 刘小何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编辑 贾瑞凯

青 海 文 物

青 海 省 文 物 处
青 海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编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 10.5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728-4/K·310 定价: 80.00元

前言

桑结加

幅员辽阔的青海高原，自古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着青海多民族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青海的考古发现硕果累累，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各个时代，都有十分丰富的文化遗存。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标志之一的彩陶，仅青海就出土了数万件，其造型之多样，纹饰之繁丽，在全国亦居前列。著名的卡约文化，是以青海境内发现的卡约遗址命名的青铜时代文化，它起源于齐家文化，却又是地道的青海土著文化，还被公认为是古代羌族文化遗存。诺木洪文化则分布在广袤的柴达木地区，与卡约文化一脉相承。青海古代的羌戎文化曾对西周奴隶社会的崛起和兴盛作出过贡献……。这些远古文化遗存表明，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没有吸收和融汇，也就没有青海数千年的文明史。在青海这块偏远的高原地区，我们的祖先以草原般的胸怀、兼容并蓄的品格，不断吸收接纳各民族的文化养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灿烂文明。在青海高原 72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从最早繁衍生息的羌人，到以后的匈奴、汉、鲜卑等民族，以至元代以后，汉、藏、蒙、回、土、撒拉等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开发着这块宝地，创造了青海悠久的历史文化。尽管历史上也曾几度电闪雷鸣，发生过多次民族地方政权兴衰更替，以及与中原政权的局部战争，但更多的则呈现出民族相亲、茶马互市的融融景象。各民族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互融汇的过程中，加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增强了凝聚力，为祖国的团结、统一做出了贡献。《青海文物》这部画册，荟萃了青海文物的精华，出版这样一部全面介绍青海文物的画册，在青海省尚属首次，它凝聚着广大考古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汗水，反映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的重大成果。通过这个窗口，可以形象地了解青海的历史文明，有助于激发我们对这块高原厚土的挚爱之情。

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文物价值的实现，不仅在于发掘、保护，重要的在于研究、宣传和利用。出版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画册，正是利用文物进行宣传教育的良好形式。希望人们通过画册，由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次去审视青海的过去，努力建设青海的现在，把握青海的未来。

目 录

前 言	桑结加 1
青海文物概述	3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汉、魏至南北朝时期	
唐、宋时期	
元、明、清时期	
图 版 (1—243)	17
图版说明	145

前言

桑结加

幅员辽阔的青海高原，自古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着青海多民族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青海的考古发现硕果累累，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各个时代，都有十分丰富的文化遗存。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标志之一的彩陶，仅青海就出土了数万件，其造型之多样，纹饰之繁丽，在全国亦居前列。著名的卡约文化，是以青海境内发现的卡约遗址命名的青铜时代文化，它起源于齐家文化，却又是地道的青海土著文化，还被公认为是古代羌族文化遗存。诺木洪文化则分布在广袤的柴达木地区，与卡约文化一脉相承。青海古代的羌戎文化曾对西周奴隶社会的崛起和兴盛作出过贡献……。这些远古文化遗存表明，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没有吸收和融汇，也就没有青海数千年的文明史。在青海这块偏远的高原地区，我们的祖先以草原般的胸怀、兼容并蓄的品格，不断吸收接纳各民族的文化养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灿烂文明。在青海高原 72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从最早繁衍生息的羌人，到以后的匈奴、汉、鲜卑等民族，以至元代以后，汉、藏、蒙、回、土、撒拉等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开发着这块宝地，创造了青海悠久的历史文化。尽管历史上也曾几度电闪雷鸣，发生过多民族地方政权兴衰更替，以及与中原政权的局部战争，但更多的则呈现出民族相亲、茶马互市的融融景象。各民族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互融汇的过程中，加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增强了凝聚力，为祖国的团结、统一做出了贡献。《青海文物》这部画册，荟萃了青海文物的精华，出版这样一部全面介绍青海文物的画册，在青海省尚属首次，它凝聚着广大考古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汗水，反映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的重大成果。通过这个窗口，可以形象地了解青海的历史文明，有助于激发我们对这块高原厚土的挚爱之情。

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文物价值的实现，不仅在于发掘、保护，重要的在于研究、宣传和利用。出版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画册，正是利用文物进行宣传教育的良好形式。希望人们通过画册，由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次去审视青海的过去，努力建设青海的现在，把握青海的未来。

青海文物概述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因其境内有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而得名。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等著名亚洲长河，均发源于省境西南部。青海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地上、地下保存着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物。四十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已经调查登记的文物遗存达4,300余处，征集和发掘出土的各个时期、不同质地的文物达10万余件。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青海地区各民族的历史、青海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关系、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古代我国和中亚、西亚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都有重大意义，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旧石器时代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青藏高原进行普查时，在柴达木盆地南缘的格尔木河上游三叉口（海拔3,500米）、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头沱沱河沿、霍霍西里（海拔均在4,300米以上）三个地点采集到10余件打制石器。这些石器主要是石核、石片等和砾石工具。一般认为我国旧石器的显著特征是以石核、石片为主要成分，以石锤直接打击、单面反向加工为主要方法。根据这些石器的种类、打制方法和石锈推断，它们应该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1980年夏，省文物考古队在共和县曲沟地区的托勒台又采集到一大批打制石器，也被研究者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

上述地点采集到的文物，由于没有发现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地，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

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地貌系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海西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采集到一批旧石器。次年8月，盐湖研究所在同一地点又采集到一批标本。两年后的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同一地点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地。在这里先后采集到的标本有石核2件、石片110件，其中包括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41件，总计112件。除少量使用压制修整技术外，大部分均用石锤直接打击而成。这些工具的出土和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地的发现，充分证明了这里曾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生存过的地方，也表明狩猎是当时先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据地质学测定，湖滨阶地形成的年代距今至少有23,800年；与石器共出的介形虫测定结果又告诉我们，将石器制成年代定为距今30,000年是完全可信的。

在海拔 4,000 米左右的青藏高原腹地多处发现打制石器,说明了远古时期这里有着比较适合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只是在第四纪晚期,青藏高原大面积隆起之时,由于地壳变动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使远古人类昔日生活、劳动和繁衍的地方,逐渐变成了如今荒芜漫远、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极差的草原畜牧地带。这些人类文化遗物的出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填补了我国考古学早期人类活动在地区上的空白,并为进一步调查、研究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1980 年夏,省文物考古队在贵南县拉乙亥乡(属龙羊峡水电站水库淹没区)发现了 6 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分别编号为 8021—8026 号。在 8021 地点进行发掘时,揭露面积 236 平方米,出土文物 1,489 件,其中石器 1,480 件,骨器 7 件,装饰品 2 件。石制品中,没有使用痕迹的石片占 90% 左右,另外还有石核和石器等。石器的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砥石、研磨器和磨色板等。石器的加工技术可分直接打击法、间接打击法和琢修技术。琢修技术是中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大特色,这表明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在揭露范围内发现 30 多座灶坑。灶坑一般呈椭圆形,红烧土范围多在 50×40 厘米左右,平底或呈锅底状,少数为深坑形。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种类有环颈雉、鼠兔、沙鼠、喜马拉雅旱獭、羊、狐以及少许鸟蛋皮。部分骨骼上可见火烧和人工敲砸的痕迹。拉乙亥遗址中未见陶片和磨制石器等典型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也不见房址、灰坑、窖穴之类的新石器时代居住痕迹,可以认定它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以后、有陶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古文化遗存,可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址内。拉乙亥遗址出土的木炭经碳 14 测定为公元前 4745 ± 85 年,这一遗址的发现,说明当中原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时,青藏高原地区仍处在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东起甘肃境内的泾水、渭水上游;西至青海境内黄河河曲的兴海、同德一带;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以洮河、大夏河、湟水中下游为中心。青海地区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存达 230 余处,在东起甘青交界,西至兴海县境,北入大通河谷,南达隆务河流域的广大地域内均有分布,以毗邻甘肃的民和、乐都两县最为密集。已发掘的有大通上孙家寨、民和核桃庄、乐都脑庄以及龙羊峡水电站库区的尕马台、烧炭沟和麻尼湾等地的遗址和墓葬。由于时代早晚和分布地域的不同,马家窑文化又可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相互联系、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经碳 14 测定,并经校正约为公元前 3,300—2,050 年。经过对青海西宁朱家寨、民和马厂塬等地发现的分别属于半山期和马厂期的 50 多具人骨进行分析鉴定,可以肯定马家窑文化的居民是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青海一些地方出土的陶塑人头像或陶器附饰的人像看,有些是披发的。根据历史记载,古代戎、羌族都是披发的。马家窑文化居民已经养羊,而

“羌”的本义就是牧羊人，所以，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当是戎、羌族系的祖先。马家窑文化遗存有一个数量由少到多，分布地域由小到大的发展进程，这充分显示了先羌文化发展繁荣的历史轨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相当发达，并且盛行彩绘陶器（简称彩陶），彩陶数量众多，就成为马家窑文化的最大特色，由于它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两省，自然就成为甘、青地区远古文化的重要标帜。这些斑斓多彩的彩色陶器，既是当时人们日常实用的生活用具，也是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作品，成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马家窑文化中的石岭下类型，在青海境内仅发现 10 处，局限于毗邻甘肃的民和、循化两县。1980 年民和阳洼坡遗址的首次发掘揭示了这类遗存的主要文化面貌。在揭露的 850 平方米面积内，发现房址 5 个，灶坑 11 个，灰坑 3 个，出土石、骨、陶质各类文物 3,000 余件。陶器除容器外，尚有环（特多）、刀、球、纺轮等；石器主要是做为农业生产工具的斧、锛、凿、刀、环、球等；骨器有针、锥和镞等。这些文物的出土，表明当时人们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但狩猎还是先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器残片出土最多，其陶质有泥质红陶、灰陶和夹砂红陶三种，并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彩陶的器形以平底钵和曲腹盆为最常见，纹饰有圆点纹、弧边三角纹、交叉斜线纹、网格纹、连弧纹以及弧边三角纹分割形成的空地花瓣纹等。这些器形和纹饰，含有不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更多的带有马家窑类型早期风格。因而，这一类型文化遗存应当是它们之间的过渡形态。在已发掘的遗址中，出土许多半地穴式方形房址，墓室一般为方形木框结构。就其墓葬而言，成年人以单人葬为多，并未发现男女合葬墓，但大通上孙家寨遗址 268 号墓埋一成年男性，随葬一彩陶壶口及颈，369 号墓埋有一成年女性，随葬与 268 号墓内同一彩陶壶的腹和底，可见其关系不属一般。幼儿则流行瓮棺葬，瓮棺作立式堆放在圆形竖穴土坑内，这与其它文化瓮棺葬通常在椭圆形竖穴土坑内横置瓮棺的埋葬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别。从遗址出土物与随葬品中可以肯定，原始农业是马家窑类型人们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狩猎业也占一定地位。出土物中以石器为主，其中斧、锛、凿、刀、磨谷器较多，还有少量石弹丸，此外还发现骨镞和鱼钩。马家窑类型的制陶业十分发达，从出土众多的各种陶器看，器型有壶、瓶、盆、钵、罐、碗、勺、缸、瓮等各种类型俱全。彩陶一般占一半左右，以黑彩为主，间有红彩和白彩。由此可见，马家窑类型的制陶业已十分发达。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五人集体舞蹈纹，生动地反映了先民们欢乐歌舞的景象，是极难得的艺术品。此外，民和核桃庄出土的波纹彩陶盆和弦纹彩陶瓶也都是这一时期彩陶的代表作品。

半山类型遗存在青海的分布范围与马家窑类型相当，但数量较少，发现不足百处。已发掘的地点有乐都柳湾、民和阳山、循化苏呼撒、同德兔儿滩等处，共 400 余座墓葬。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石球、石纺轮。最常见的随葬品有绿松石、骨珠、骨片等装饰物。陶器也很普遍，彩陶往往占二分之一以上。彩陶中的黑彩为数不少，黑、红两彩合镶最为常见。红彩通常绘在器物的口部、颈肩交界处、或用于腹部主体图案骨式的勾勒。纹饰以旋涡纹、条带纹、锯齿纹、菱格纹、葫芦纹、圆圈纹和波折纹较为常见，并常以黑色锯齿纹作为罐边，这是半山类型的突出特点。半山类

型壶类造型的突出特点是直口、长颈、广肩。半山类型晚期出现一种新的长颈壶，其颈部和腹部上、下各有一耳。民和阳山墓地还出土三件喇叭形彩陶器，一端盘口似罐，一端呈喇叭形，四周有一圈倒刺，两端皆可蒙上兽皮，应为陶鼓。虽为明器，但确是原始社会晚期难得的乐器标本。

马厂类型遗存在青海境内发现达 500 余处之多，其分布地域虽基本与半山类型相若，但在黄河流域分布不够深入。已发掘的地点有民和马牌、乐都柳湾等地，共发掘墓葬 900 余座。马厂时期农业相当发达，有两点可资证明：一是斧、镑、凿、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出土数量骤增；二是墓中随葬的粗陶瓮中多有粟类作物痕迹。男性墓葬多出土斧、镑、凿、刀等生产工具；女性墓葬多随葬陶、石纺轮和骨针。这种现象反映当时社会男女分工已较为明确。随葬品中以陶器为大宗，多者百余件，少者一两件，这种数量悬殊的现象应该是贫富分化、财产私人占有、原始氏族社会解体的重要标帜。

马厂类型彩陶器形复杂多样。仅柳湾一地即达 30 余种，纹饰也繁缛多变、富丽堂皇。常见的纹饰有四大圆圈纹、拟人（蛙）纹、波折纹、菱格纹、网纹、回纹、连弧纹、垂帐纹等。仅四大圆圈纹内的附饰变化组合即达五百余种之多。就色彩而言，马厂早期仍保留半山类型黑红两彩的遗风；中期红彩消失，已成黑色单彩，但在着彩部位往往涂上一层红色陶衣。乐都柳湾出土的裸体人像壶和人头像壶，民和加仁庄出土的鸭形壶、山城出土的人头罐、大塬出土的双联罐、官户台出土的提梁罐等等，都是马厂类型彩陶中的瑰宝。

青铜时代

青海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非常发达，通过调查登记的青铜时代各种文化遗址竟达 2,400 余处，包括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和所谓“唐汪式陶器”，几乎遍布青海全境。据碳 14 测定，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的齐家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而卡约文化晚期遗存则延续到汉代。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南岳”，指衡山；“三危”，为山名，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河关”为县名，属汉代金城郡。金城郡为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置，领允吾等 13 县，辖今兰州、临夏及西宁一带。由此可知，这一时期活动于甘、青地区的只能是羌族。这些古文化遗存，其数量的骤增和分布地域的迅速扩大，反映了古代羌族文化在这个时期的发展。

齐家文化是青海青铜时代的一种文化，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但已经出现铜器，其分布范围虽然大体说来与马家窑文化相当，但少量遗址向西已达到青海湖北岸的沙柳河边，向南已达到黄南、果洛地区交界的黄河两岸。齐家文化之后，青海地区以卡约文化为主体，东部有辛店文化，西部有诺木洪文化，遍布在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广大地区。青海南部的玉树、果洛两地，虽无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化遗物，但从调查采集的零碎陶片等文物观察，很可能有青铜时代的遗物。

齐家文化已经发掘的地点有乐都柳湾、西宁沈那、贵南杂马台、大通上孙家寨、民和中川旱台、互助总寨、平安东村等地。坚固、美观、具有防潮作用的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式的白灰面房子是齐家文化先民在建筑技术上的一大创举。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品种齐全，其中一部分还选用了硬度较大的玉石料。墓葬和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马、牛、羊、猪、狗等动物骨骼，表明在狩猎以外，家畜饲养业已比较发达。由于轮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制陶业较前进步得多。陶器的种类，仅柳湾一地即达 20 余种，双大耳罐和高领折肩篮纹壶是齐家文化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齐家文化的彩陶较少，但多用酱红（或桔红）色绘制出同心三角纹、折线纹、蝶形纹等图案。齐家文化手工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冶铜工艺上。贵南杂马台 43 座墓葬中有近三分之一墓葬出土铜器，种类有铜泡、铜指环、铜臂饰和铜镜。25 号墓出土的一面七角纹铜镜是我国迄今已知时代最早的铜镜。在墓葬中可以明显看出随葬品的多寡悬殊、人骨架排列男尊女卑的现象和非正常死亡骤然增多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贫富分化的现象已经出现，导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其社会发展进程至少已处于军事民主阶段。

卡约文化遗存在青海境内已发现 1,700 余处，它是青海地区分布地域最广、遗址数量最多、时代下限最晚的青铜时代文化，可延续至汉代以后。调查统计资料表明，卡约文化以西宁、湟中为中心，向四周作辐射状分布，湟水流域，黄河河曲以东地带分布密度较大。已发掘的地点有大通上孙家寨、湟中下西河、湟源中庄、和莫布拉克、循化阿哈特拉、苏志和苏呼撒、贵德山坪台、共和合洛寺、贵南达玉台、官塘和加土平等地，发掘墓葬 2,000 余座，揭露遗址面积千余平方米。

卡约文化时期，人们大体过着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副的定居生活。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一些地区的卡约文化则以畜牧业为主，甚至过着游牧的生活。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物质生活千差万别，加上时代早晚的不同，自然会出现一些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类型。目前已发现的有湟水流域的卡约类型（时代较早），黄河沿岸的阿哈特拉类型（时代较早），以及湟源峡以西、青海湖周围地区的中庄类型（时代最晚）。卡约文化制陶业不甚发达，制作比较粗糙，品种相对单调，这是其经济生活内容所决定的。陶质以夹砂红陶和灰陶为主，罕见细泥红陶，彩陶更少。彩陶纹饰早期有回纹、三角纹、网格纹、勾连“S”纹等；晚期则以双线回纹、涡旋纹为多，还有一些狗、鹿、羊等动物图案。卡约文化的冶铜业比较发达，已出土的铜器除斧、钺、刀、矛、镞、凿、戈外，常见的还有泡、镜、环、扣、牌、铃、管和连珠饰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属于装饰品的还有骨珠、玛瑙珠、琥珀珠、海贝、骨贝、石贝、铜贝、金贝、金圈、金耳环、蚌壳、鹿牙、狗牙、獐牙、羊关节骨和羊蹄饰等，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卡约文化的相对年代据碳 14 测定，大致在商末至周代，少部分遗存则一直延续到汉代。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城清理过 6 座青石板拼成的石棺，这是卡约文化在我省西部牧业区的首次发现。其时代约为汉代，为研究我省西部地区古代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辛店文化遗存在青海地区可分为三种类型：山家头类型、姬家川类型和张家嘴类型。总体上讲，辛店文化的陶器质地相当粗糙，罕见细泥陶。由于其器表常施上一层

淡黄、土黄乃至青白色的陶衣，使其陶器一望可知，极易分辨。时代较早的山家头类型陶器已出现圜底器，但大部分是薄胎、细泥质、折肩的平底器，具有较明显的齐家文化陶器遗风。凹底和凹式圜底是姬家川类型陶器造型的突出特点；张家嘴类型以平底器为主，罐类常见三矮足。在制陶业中广泛应用细绳纹。彩陶在辛店文化各个类型中所占比例均不小，常见的纹饰是回纹、宽带纹、双钩纹、太阳纹、云雷纹、涡纹、横竖“S”纹、复线垂线纹和折线纹等，还有狗、鹿、羊、鸟等动物纹饰。姬家川类型以黑彩为主，纹面较宽，显得粗犷豪放；张家嘴类型常以红彩为地，再绘黑彩，纹饰显得细腻柔和。

辛店文化也有较多的铜器出土，除少量的刀、锥、凿等小型工具外，仍以铜泡、铜铃、铜牌、铜连珠饰为多。总的看来，不论铜器的品种和数量均远逊于卡约文化，但其社会发展进程却与卡约文化相似。它们是齐家文化之后，河湟地区东西并列的两支青铜时代文化。

唐汪式陶器在青海境内的分布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大致相同，并多有共存关系。它的归属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主要器形有双大耳罐、四耳罐、无耳罐、单耳杯、双耳杯、双耳钵、豆、鬲等。多施朱色陶衣，上绘黑彩，以波纹图案为主，还有回纹、斜线三角纹等。其它装饰是戳点纹、划纹、乳丁纹等。

诺木洪文化是1959年在柴达木盆地诺木洪的塔里他里哈首次发掘而命名的。其分布范围，目前已知大致分布在柴达木盆地的周边地区，以盆地东南缘一带较为集中。塔里他里哈遗址面积不下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最厚达8—9米。发掘部分出现房址11座，地坯坑9个、家畜圈栏1处、瓮棺葬3座。较多的石斧、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以及麦类作物的发现，都说明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用牛、羊毛编织的毛布、毛带、毛绳和毛线，有的染成红、黄、蓝不同色彩；毛布除采用经纬线编织外，有的还采用了人字形编织法。遗址内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以及圈栏内马、牛、羊、骆驼粪便堆积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畜牧业也相当发达。铜斧、铜刀、铜镞、铜钺等的出土和炼铜工具及铜渣的发现，证明诺木洪人有制造铜制品的能力。诺木洪文化的陶器以素面的夹砂红陶和灰陶为主。可以复原的器形有罐、缸、瓮、盆、杯、碗等。从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分析，诺木洪文化与卡约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以致有人认为它是卡约文化的继续和发展。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毛布经碳14测定，距今为 2715 ± 115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 2905 ± 140 年，相当于西周早期。因此，诺木洪文化应当是青海地区西部的一支古代羌族文化遗存。

汉、魏至南北朝时期

西汉中叶以前，整个青海是羌人聚居之地。汉武帝时征伐四夷，开地扩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打通河西走廊，隔绝羌、胡交关之道，与匈奴激战，当时汉军活动地域仅限于湟水下游地段。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十万平定羌乱，深入河湟地区，迫使羌人西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王朝始设护羌校尉，专事管理羌人事宜，并成为定制。

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设金城郡以加强对河湟地区的监控。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在河湟地区增设临羌、安夷、破羌、允吾、允街、浩门、河关等七县，归金城郡（治允吾，今民和下川口）管辖，河湟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郡县体制之内。河湟地区成为汉族、羌族和小月氏人杂居之地。西汉末年，王莽当权，为炫耀威德，诱惑羌人献地称臣，于青海湖环湖地区建西海郡（治今海宴三角城），进一步把青海湖地区划入汉王朝版图。汉末建安中，以金城郡西部地区分置西平郡（治西都县，今西宁），辖临羌、安夷、破羌、西都四县。这是西宁成为青海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枢纽的开端。

两汉时期的墓葬在湟水流域分布极为广泛，黄河沿岸也有零星发现。建国后，特别是 1973 年以来在西宁、大通、湟中、互助、平安、乐都和民和等地共发掘汉墓 200 余座，其中以大通后子河发掘规模为最大，达 182 座。西汉时期的墓葬以竖穴土坑墓、洞式墓和竖井木椁墓为主；东汉及其以后墓葬则以砖室墓为主。砖室墓又有长方形券顶墓、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墓、前后室双穹窿顶墓以及带耳室墓等多种。不难看出，青海地区汉墓形制的演变基本上沿袭了中原汉墓的发展轨迹。在随葬品方面也大体上与中原汉墓雷同。如陶器中常见的壶、罐、鼎、豆、仓、井、灶等；铜器中常见车马饰、镜、带钩、弩机、钱币、印章等。此外，木制的车、马俑，漆制盒、奁、耳杯之类也较常见，这些可以说是主流。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墓葬中有夹砂粗陶的单耳罐、双耳罐、三足杯之类。这些夹砂陶器虽与青铜文化遗物有别，但绝不同于汉文化之物；在大通、互助、平安、共和等地的汉墓中，习见马、牛、羊、鸡、狗等动物殉葬；青铜时代墓葬中流行的二次迁葬和二次扰乱葬也同样盛行于青海汉墓；在汉墓群中还夹杂有部分明确属于匈奴人的墓葬。所有这些，都是汉文化与羌、胡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成为青海地区汉墓一个突出的文化特点。

汉代所建的一些郡县故城在农业区者多已无存或仅留部分残迹。王莽所建的西海郡城由于地处偏远牧区至今仍保存较好。西海郡及下隶的环海五城（含郡治）也都在 1983 年被发现。它们是：位于青海湖东北的海宴县尕海古城；位于青海湖西北部的刚察县北向阳古城；位于青海湖西南部的兴海县支东加拉古城；位于青海湖东南部、濒临黄河的共和县曲沟草多隆古城（已被龙羊峡水电站库区所淹没）。这些古城通常都建筑在视野比较开阔的黄土地带。城多呈正方形，边长一般为 400 米左右，其中以西海郡城规模为最大，边长超过 600 米。西海郡古城自 1983 年发现以来，城内多次采集到汉代和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布、货泉、大泉五十、一刀平五千等钱币，五铢、小泉直一等钱范，证实了“郡国铸钱”的历史记载。著名的“始建国虎符石匮”的出土，确证该城为王莽所建的西海郡无疑。虎符石匮下部作匱形，中空有室，匱盖上雕有伏虎，长 1.37 米，宽 1.17 米，通高约 2 米，为全国首见。值得一提的还有，城内先后多次发现有“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文字瓦当多件。历史上以“元兴”为年号者有三：东汉和帝、三国吴末帝和东晋安帝。东吴、东晋皆偏安江左，国力衰微，鞭长莫及，应与青海的西海郡无涉，所以“元兴”只能是东汉和帝的年号，为公元 89 年至 105 年。《后汉书》中还有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和帝刘肇“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管理青海湖沿岸政务的记载。

已出土的汉代文物中，较重要的还有：1942年出土于乐都县白崖子的东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赵宽碑；大通上孙家寨乙区1号墓出土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官印；民和中川出土的“陇西中部督邮印”，上孙家寨甲区115号墓出土的记载当时军功、等级、战阵、赏罚、兵车配备和兵器使用内容的木简；上孙家寨乙区3号墓出土的腹部锤鏤有忍冬纹、颇具波斯风格的单耳镀金银壶；平安县南滩出土的有有力士、甲骑、宴饮、神鸟和仙人六种题材的画像砖等，为研究汉代行政建制、军事制度、文化艺术、中原对边疆地区的文化影响、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以及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豪强并起，割地称雄，地方政权纷纷建立。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北方的120多年，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后又形成南北对峙，直到隋代统一全国，南北分裂延续了270年之久。这一时期，青海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南凉在青海东部立国；一是吐谷浑人雄踞青海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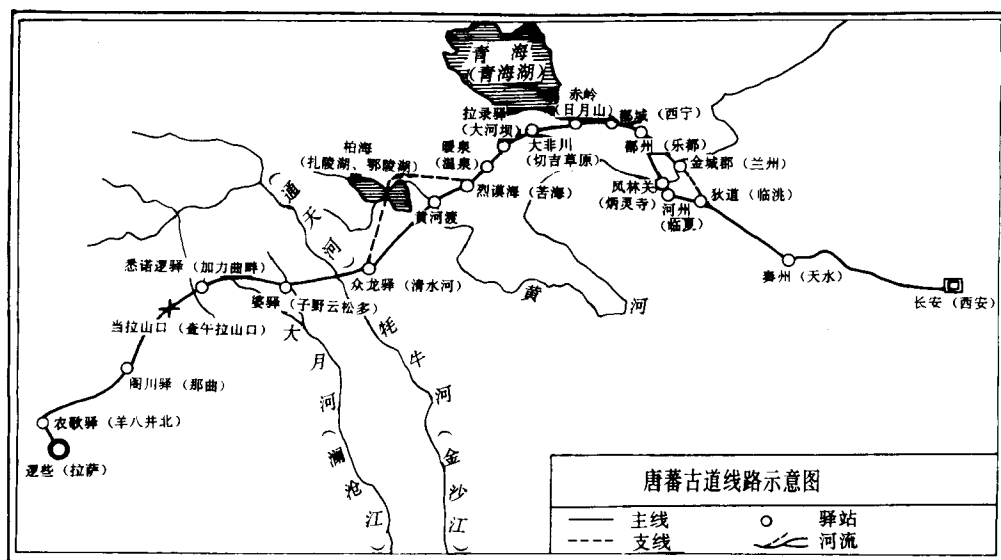
公元399年，鲜卑族首领秃发乌孤率部进入青海东部，建都于乐都，成为青海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前后18年中，虽数次迁都于西平（今西宁）、姑臧（今武威）和乐都之间，然以在乐都建都时间为长。南凉乐都故城在今乐都迤西约2公里的大古城村，经历沧桑，其残垣断壁所存无几，但这里至今仍保留有大古城、小古城（实为内、外城）、南门什字、北门壕子等地名。西宁城西杨家寨有一高30余米的方形夯土台，俗称“虎台”，传为南凉王昔日检点兵马之处。西宁城东南小圆山有一高30米、径40米的封土堆，与史载南凉王秃发利鹿孤死后“葬于西平之东南”（《十六国春秋》）相符，疑为南凉康王墓。

吐谷浑人原为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410年，吐谷浑人开始进入今青海贵南穆格滩一带，其地在黄河河曲以南，被称为“河南王国”，这是吐谷浑历史上在青海的第一个根据地。今贵南、同德等地很多形制较小的古城当为这一时期的遗存。公元452年，吐谷浑王拾寅“始邑于伏罗川（今都兰县）”（《北史·吐谷浑》），是为吐谷浑的第二个根据地。公元540年，“夸吕立，始自称为‘可汗’，居俟伏城，在青海湖西十五里，虽有城廓而不居。”（《北史·吐谷浑》）这是吐谷浑的第三个根据地。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附近的铁卜加古城就是吐谷浑后期的王城所在。伏俟城东连西平（今西宁）、金城（今兰州），可与南北对峙的政权贸易通商；西接鄯善（今鄯善）、喀什，可与中亚各国交通往来，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必经的咽喉要道。以往人们谈及“丝绸之路”时，往往多提由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那条大道，而忽视、甚至不提经西宁西入柴达木盆地，转赴南疆，再西去中亚的这条古道。其实这条古道早在西汉初叶就已存在，并因要通过羌人聚居之地，而被称为“羌中道”。在公元四至六世纪河西战乱频仍，交通阻塞的岁月里，这条途经青海的丝绸南路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河西走廊。1956年在西宁隍庙街（今解放路）集中出土了中世纪颇具国际货币地位的波斯银币，充分证明了这条古道途经青海，西宁为当时的重要驿站。前已提及的大通墓葬中出土颇具波斯风格的银壶，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今日青海通往新疆的公路，基本上还是沿着昔日丝绸南路行进的。

唐、宋时期

公元 618 年，李唐王朝建立后，改西平郡为鄯州，辖湟水（今乐都）、龙支（今民和北古城）和鄯城（今西宁）三县。改浇河郡为廓州，辖广威（今化隆群科），达化（今尖扎康扬）和米川（今化隆甘都）三县。又置陇右节度使于鄯州，下统十一军三守捉，牢固地控制了河湟地区。

与此同时，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先后打败羊同、璨、琳等部，统一西藏本部，定都逻些（今拉萨）。以后北向吞并苏毗、多弥、白兰、党项等部，尽占河源以南广大地区。高宗龙朔三年（公元 663），吐蕃一举剪灭吐谷浑，其疆界开始与唐王朝接壤。以后的数百年间，它虽与唐王朝有不少瓜葛，甚至对阵交兵，但和平交往、睦邻友好却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文成公主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奠定了唐蕃友好大厦的根基。景龙四年（公元 710 年）金城公主进藏与弃隶缩赞完婚，巩固和加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两度联姻建立起来的唐蕃之间深厚的甥舅关系和因此创通的唐蕃交通大道，极大地促进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历史影响。这条古道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干线之一。古道东起唐都长安（今西安），历秦州（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河州（今临夏）进今青海境内，经龙支（今民和）、鄯州（今乐都）、鄯城（今西宁）、赤岭（日月山）等，至悉诺罗驿，出今青海境，过阁川驿（那曲），农歌驿（羊八井北）到达终点逻些（今拉萨）。全长约 3,000 公里，一半以上在今青海境内。今西宁以西的唐代遗址有临蕃城（湟中多巴）、绥戎城（湟源北古城）、石堡城（湟源大小方台）、大非川古战场（兴海切吉草原）。此外，在日月山口现存有唐蕃交马互





海西、海北岩画示意图